

俄乌冲突下德国的“时代转折”

——基于历史记忆影响的分析*

郑春荣 李 勤

摘 要：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决策的重要性，体现在由其衍生的“克制文化”始终影响着战后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走向上。俄乌冲突爆发前，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决策的克制作用依旧凸显，导致“交通灯”联合政府更倾向于运用外交政策手段解决冲突。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政治行为体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敢于突破历史束缚，做出提升国防支出和打破武器出口“禁忌”的决定，这可以归因于德国政客和选民群体的代际更替、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新世纪以来新危机、新议题接连不断，以至于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决策的克制作用有所弱化。无论如何，历史记忆对今后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德国的“时代转折”受历史记忆“残留”的制约，并非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较长时间才有望真正落地。

关键词：历史记忆； 德国； 俄乌冲突； 外交与安全政策； “时代转折”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 欧盟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导 上海 200092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D8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22)06 - 0004 - 16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批准号:20VGQ011)的阶段性成果。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在2月27日联邦议院紧急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和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时代转折”的重要时刻,^①体现了朔尔茨领导下的“交通灯”联合政府推动德国成为“真正的全球力量”^②的雄心,此举也将对德国以及欧洲的安全与防务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然而,需指出的是,“时代转折”决定的做出并非轻而易举。德国历届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延续为特征,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这和德国历史上与大屠杀和二战相关的记忆对德国外交的克制作用紧密相关。^③ 具体而言,德国在二战后形成了“反思性”的历史记忆,其中所包含的理念、信念和价值观代代相传,使德国形成了外交上的“克制文化”。这一外交文化深刻影响德国历代执政者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取向,从而在德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甚至有学者认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其历史记忆和外交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④

事实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有必要将历史记忆纳入外交决策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这是因为历史记忆作为一国政治认同的基础和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国外交决策有着重要影响。^⑤ 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德国朔尔茨政府突破了历史记忆的束缚,推动了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⑥ 为此,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一“时代转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析范本,让我们可以管窥在德国外交决策中历史记忆影响作用的变化。基于此,本文结合德国朔尔茨政府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转变,分析历史记忆在德国“时代转折”前后的影响变化,探讨为何德国朔尔茨政府能做出“时代转折”这一重大决定,以及“时代转折”相关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推进。

① Olaf Scholz, „Regierungserklärung in der Sondersitzung zum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vor dem Deutschen Bundestag am 27. Februar 2022 in Berlin“,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service/bulletin/regierungserklaerung-von-bundeskanzler-olaf-scholz-2008606>, 访问日期:2022-11-27。

② Lisa Abend/Naina Bajekal, “Chancellor Olaf Scholz Wants to Transform Germany’s Place in the World. He’d Just Rather Not Talk About”, May 19, 2022, <https://time.com/6170974/olaf-scholz-germany-interview/>, 访问日期:2022-11-27。

③ 参见郑春荣:《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4页。

④ Andrei S. Markovits/Simon Reich, *The German Predicament: Memory and Power in the new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

⑤ 参见 Peter J. Verovšek, “Collective memory, poli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the politics of memory as a research paradigm”,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Vol. 4, No. 3, 2016, pp. 529-543; Eric Langenbacher, *Power and the past collective mem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⑥ 郑春荣、李勤:《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26-154页,这里第132-133页。

一、历史记忆的概念以及对德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一) 历史记忆的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的概念已有诸多探讨。例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历史记忆——他使用的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以区别于“个体记忆”——指的是国家或集体对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理解和建构,是社会和政治身份的基础。^①换言之,历史记忆首要关注的不是过去的时期、事件,而是国家或集体对过去的时期、事件的记忆方式,即对历史时期或事件的社会建构。^②因此,历史记忆既是一国集体共有的、关于国家历史的共同想象,也是一国集体共同记忆和回忆历史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历史记忆一方面被集体不断建构,另一方面又在建构中不断地被传承和延续。

根据上述定义,德国的历史记忆主要为德国民众这一集体对德国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主观认知、当代体验及重新解释。有学者基于时间段和重要性将德国的历史记忆划分成不同的“记忆集群”,主要包括:魏玛共和国时期、第三帝国(大屠杀及二战)时期以及二战后“两个德国”时期的历史记忆。^③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德国民众对德国历史记忆的认知几乎完全被纳粹和二战历史所支配,战后德国的内政与外交决策都与这一时期的经历和教训密切相关。^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德国历史记忆对德国当前外交决策的影响,因此,关注的重点也将放在大屠杀和二战时期的历史记忆。^⑤

(二) 历史记忆对德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有关历史记忆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学者们对其从不同视角展开了分析。一方面主要把历史记忆视为自变量,认为历史记忆可在

①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② Andrei S. Markovits/Simon Reich, “The contemporary power of memory: The Dilemmas for German foreign policy”,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Vol. 2, No. 1, 1997, pp. 89 - 119, here p. 91.

③ 同上, pp. 103 - 104.

④ Leonard August Schuette, “Collective memory in Germany and the great foreign policy debate: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1, No. 4, 2018, pp. 272 - 290, here p. 277.

⑤ 基于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德国学界在讨论纳粹及二战历史影响战后德国外交决策时通常使用“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一词,德国主流媒体也普遍使用这一概念。但是,鉴于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的基础之一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因此,在笔者看来,德国的“文化记忆”“记忆文化”与“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通性,在探讨上述“记忆”与外交决策的关系时,大都强调过去对于当下的意义和重要性,为此,下文不再对上述概念进行详细区分。